

南京解放：天翻地覆慨而慷

■王凤春

南京，这座既古老又蓬勃的城市，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是近代中国风云激荡的重要历史舞台之一。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的近代史在这里开启，深远的民族觉醒历程在这里演变，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里升华。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不仅标志着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终结，也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屈辱历史命运运的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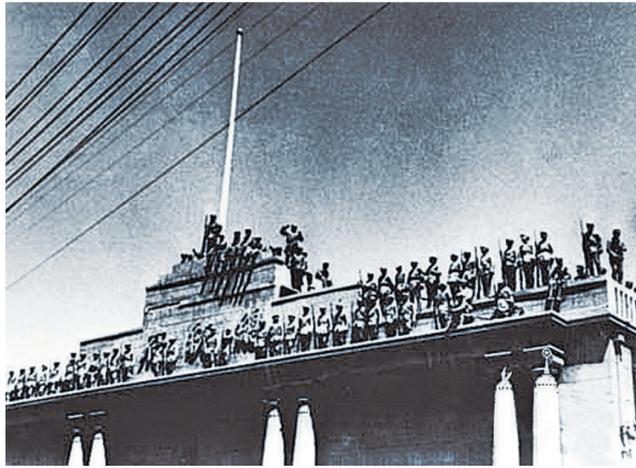
钟山风雨起苍黄。蒋介石在1949年1月，第三次宣布下野并离开南京。代总统李宗仁上台后，一面通过民主人士与共产党“和谈”，一面寻求美援企图划江而治。

在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饮马长江的同时，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一些地方实力派开始与中央分道扬镳。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民革）内部也加紧了反蒋政治宣传，提出“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拥护共产党，欢迎人民解放军，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并号召公职人员各安职守，一不跟国民党逃跑，二不破坏公物档案，迎接解放。大批传单被连夜包扎成卷，投进邮筒，分发到各机关团体。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几乎丧失殆尽，内部动摇情绪与日俱增，军官满腹牢骚，逃兵现象增多。许多有识的国民党将领纷纷与共产党方面取得联系，约定适当时机把部队带到解放区。在南京警界，还发生了大规模的警察罢岗事件，使摇摇欲坠的国民党反动政权愈加不堪一击。彼时的南京百姓人心惶惶，社会秩序十分混乱，逃兵伤兵四处闹事，地痞流氓趁机扰民，商业惨淡物价飞涨。

1949年4月1日，在国民党和谈代表飞赴北平之时，南京各大院校学生和职工举行万人游行示威，掀起“反征兵、反征粮、反征实、反美援、反假和平”运动的浪潮。

百万雄师过大江。1949年2月11日，为加强渡江作战的统一领导，中央军委决定由淮海战役总前委原班人马组成渡江战役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3月下旬，总前委根据中央军委意图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组成东、中、西3个突击集团，在江阴至湖口间500余公里的地段上，有重点地分路突破国民党军队的江防。4月20日，国民党主张的假意和谈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

破裂。当日20时，人民解放军中突击集团开始渡江。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当日夜，人民解放军东集团、西集团同时强渡长江，全线突破敌军江防。

国民党军70万重兵部署于长江防线的同时，为保障南京的安全，以李延年兵团及“首都卫戍总司令部”指挥第28军、第45军、第99军防守南京及东西地区。蒋介石命嫡系部队第28军在“三浦”（即南京市下属的江浦、浦镇、浦口）布防，利用江北的丘陵地形构筑明暗碉堡，在沿江、公路一线及北面的大小山头上筑起防线，准备死守江北桥头堡，确保南京北大门的安全。为迅速扫清南京外围障碍，渡江战役总前委要求在前哨阵地牵制南京的第三野战军第35军发起三浦战役，肃清江北的国民党军，占领北桥头堡。第35军接到命令后，立即对江浦、浦镇之敌发起强大攻击，至22日凌晨，浦口被解放军攻占，南京的国民党守军残余弃城而逃。23日清晨，代总统李宗仁及各院部官员乘飞机撤离南京，当日夜，第三野战军第35军第104师先头部队已经进入南京城。24日凌晨，英勇的解放军官兵将革命的红旗插在南京总统府的墙头，作为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南

京宣告解放。

三大战役决战后，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并直插国民党政权心脏，这一伟大的历史之变为解放战争中重要的历史节点。它标志着人民解放军有足够信心和力量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国民党军队，也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实践中探索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同时也宣告我党的工作重心自此由乡村转向城市，实现并开启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

天翻地覆慨而慷。南京解放后，渡江战役总前委、华东局的主要领导先后会聚南京，共同商讨接管并建设南京的具体部署，共产党人开始了建设新南京的新征程。

5月上旬，南京市委、市政府先后成立，市委从成立起就号召“全体干部执行党的政策，坚定自己的立场，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反对堕落腐化的倾向”，强调首要任务就是进行思想整顿、学习城市政策和“人城守则”。南京是国民党的政治中心，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统治机器，需要接管的中央和南京市两级政府等单

位有700余个，国民党政府留下的公务人员、警察、工勤人员等有7万余人。在接管城市过程中，来自9个解放区的随军南下干部和南京地下党干部戮力同心、团结奋斗，仅用1个多月时间便完成复杂的接管工作。

6月10日，《新华日报》发表了在南京创刊后的第一篇社论《为建设新南京而奋斗——南京人民当前的任务和努力方向》。该社论提出改造旧南京、建设新南京的四大任务：全力恢复生产，逐步发展生产；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使潜伏特务匪徒无活动可能，建立安定的社会秩序；扶助、劝导失业半失业人员参加生产，营造生产建设的良好环境；肃清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法西斯文化余毒，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南京解放不仅使人民获得新生，也使这座饱经风霜的历史名城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人间正道是沧桑。75年前，毛泽东在北平香山得知南京解放的消息，挥笔写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渡江战役胜利和南京解放，标志着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有力推动解放战争战略追击的进程。在南京解放后不到半年时间里，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迅速解放了全国大部分地区，为新中国诞生奠定了坚实基础。南京这座城市，曾是近现代史的起点和终点，但远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点，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伟大壮举就是向全世界宣告，革命决不止于南京。

南京的解放，是历史前进的必然，也是人类社会变化规律的生动体现。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等卓越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誓将穷途末路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彻底消灭，这是顺应时代发展趋势之举，是顺应人民呼声并按照自然客观规律改造一切的具体实践，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革命豪情与革命胆识的生动体现。



华章75年·解放记忆

能用为止。

医院条件虽然艰苦，红军战士的精神却很饱满，革命热情高涨。伤病员养病期间仍关心前方战斗形势，伤没好就争着要出院上前线。一些轻伤员每天坚持为前方削制竹钉。病房里经常可以听到他们相互鼓舞的嘹亮歌声。有时他们还会开展多种文娱活动，自编自演一些节目。当有伤病员出院时，大家还会唱自编的歌曲来欢送。

毛泽东、朱德等十分关心伤病员们的生活，每次路过小井都要去医院探望伤病员，询问医务人员缺不缺药品；每次打完仗、打完土豪，都会派人将部分战利品和没收的物品送至医院。当地群众也时常把自家产的红薯、板栗等农产品送给医院，帮助医院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1929年1月，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为摆脱敌军包围，红四军前委决定实施“围魏救赵”策略，只留一小部分部队守山，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红军医院属于留守之列。一天夜里，国民党军窜入小井，医院的130余名重病员和部分医务人员来不及转移，不幸被俘。敌人对我军伤病员严刑拷打，威逼伤病员说出红军主力的去向。伤病员们忠贞不屈，最后全部英勇就义，医院也被烧毁。英雄们倒下后，隐藏在深山密林里的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将他们的遗体掩埋在附近的稻田中。

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政府按历史原貌修复了小井红军医院，还将烈士们的部分遗骨从小井迁到茨坪重新安葬，并建造革命先烈纪念馆。

如今，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展厅内，还陈列着当年建造医院时工人们用过的刨子和墨斗，以及红军医务人员用过的医书、碾药轮和药臼等。这些文物历经岁月沧桑，是我军医院早期艰苦卓绝发展历史的重要见证，也激励着一代代军队医务工作者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用辛勤的劳动呵护军民的健康。



链接历史



中国古代兵器面面观

戈、戟、钩镰枪、狼筈，均是古代长兵器，除戈外，均具有刺杀功能，它们在古代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除明代出现的狼筈形制特殊外，前三者形制上多有相似之处。

戈诞生于新石器晚期，由类似镰刀类的劳动工具演化而来，盛行于商周至战国时期。戈由戈头、柄和鐏（柄下端的饰件）构成，是一种以勾、啄方式打击敌人的曲头长兵器。戈头由援、内、胡3部分组成。援是横出的杀伤部位，由上下两刃向前弧收成尖锋，用以钩啄敌人。内位于援的后尾，用来穿入戈柄，其上有穿绳绑缚戈柄用的孔，称作“穿”。胡是援下刃延伸的部分，其上也有穿，胡越长穿越多，用绳绑缚戈柄时会更加牢固。《周礼·考工记》中记录了当时戈的各部构造数据：“戈广二寸，内倍之，胡三之，援四之”。意思是，戈的援上下的刃之间两寸宽，内四寸长，胡六寸长，援八寸长。由于春秋时期度量衡不统一，各地制造的兵器大小有差异。通常长戈用于车战，短戈用于步兵。戈在商周至战国时期十分盛行，被广泛用于车战。作战时，车上持戈的战士横向挥戈扫荡敌人，在战车高速冲击下，其攻击威力远大于直刺兵器。随着骑兵出现和兵器发展，戈在东汉时期逐渐销声匿迹。

戟是矛和戈的结合，将戈的前端装以矛尖就是戟。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戟出现于商代晚期，秦汉时期逐渐流行。戟可分为车戟、骑戟、步兵戟。戟头在戈头援、内、胡、穿4部分的基础上，多出了矛锋，使戟具有刺杀功能。战国之前，戟多为“十字铜戟”。战国晚期，随着铸铁技术出现，戟逐渐进化为“卜字铁戟”。西汉时期，随着骑兵作战盛行，戟进一步演化，援上翘成刺，不再注重钩啄功能。东汉末年，戟板为盛行，还演化出短柄“手戟”，可两戟并用称为“双戟”。南北朝时期，随着重骑兵出现，戟逐渐被枪、马槊等兵器取代，隋唐以后，逐渐成为礼仪用具。

钩镰枪从造型上看，将戟横向的锋刃内弯就是钩镰枪。钩镰枪的使用最早出现于唐，宋时达到巅峰。钩镰枪前端为锋利的枪锋，侧有锋尖向后的曲刃，呈镰刀状。枪锋主要用于直刺，而侧刃不仅可以勾刺，也可用于钩挂敌方铠甲将其拉倒。宋时，宋

军常与金的骑兵作战，钩镰枪可用于钩砍马腿，是对付骑兵的利器，其因此盛行。《武经总要》中记载的钩镰枪类兵器不下8种，其中就包含单钩镰枪和双钩镰枪。

狼筈是一种形制非常特别的长兵器，由明代将士自创，后改进成为明军制式装备。狼筈是由坚韧的毛竹为主体，布有9至11层节叉，用火烫熨得直有钩，灌以桐油并缚毒，柄长一丈半，顶端装枪头。狼筈在戚家军与倭寇对战中大显身手，攻击和防守性能俱佳，倭刀虽锋利却砍不断软枝，竹节层层深，可阻挡长枪刺人。作战时，狼筈兵在前冲，长枪兵紧随左右，大刀兵接应于后，杀得倭寇死伤无数。狼筈是戚家军“鸳鸯阵”的必备武器，被称为“破阵第一利器”。

戈、戟、钩镰枪、狼筈，有的由劳动工具演化而来，有的是不同兵器的结合，有的是结合战争特殊需要独创，充分凝结和体现了古人的智慧。它们虽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在中国冷兵器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展出的战国铜戈。

小井红四军医院——

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所正规医院

■郗城名

在江西省井冈山市茨坪镇西北6公里处，有一个小井村，是井冈山大小五井（即大井、小井、中井、上井与下井）中较小的村庄。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的第一所正规医院——小井红四军医院便诞生于此。

1928年4月底朱毛会师后，红军的队伍逐渐壮大，井冈山根据地也得到蓬勃发展。为消灭这团革命之火，国民党军对根据地的“围剿”更加频繁，敌我斗争日益激烈，红军伤病员随之增多，原有的茅坪、大井两个规模较小的医务所已无法满足需求。考虑到伤病员住在群众家中，给群众生活带来不便，不利于伤病员集中救治，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一项重要决议：“建设较好的红

军医院”。

这项工作具体由红军后方留守处负责，地址就选在小井。为兴建这所医院，边界政府和红军从宁冈、永新、酃县等地请来许多木工、石匠和铁匠，并从红军部队抽调人员参与建设。由于缺少经费，很多红军官兵和当地群众纷纷捐出自己平时节省下来的零用钱和伙食费，最后凑足了1000余元大洋。然而，建设一所医院，这笔钱还远远不够。为此，红军战士自己动手，就地取材，上山采集木料、搬运石料。根据地的老人、孩子、妇女和伤病员也自发参与医院建设。

在根据地军民的齐心协力下，仅用两个月左右时间，一幢杉木皮的屋面、

上下两层、有32间病房的木质结构房屋在小井街边拔地而起，当时取名为红光医院，因为地址在小井，又被称为小井红四军医院。医院设有院部，院部设立了医务室、看护排、担架排、事务排，后来还成立了党总支。

小井红四军医院的诞生，让红军的医疗卫生事业迈入新的发展阶段。然而，由于敌军的严密封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物资极为匮乏，红军医院严重缺乏医生、药品和医疗器械。当时，医院所需药品主要有3个来源：一是从敌军那里缴获而来。每次打了胜仗，红军都能从敌军卫生队缴获不少药品，以缓解药品紧张。二是白区的党组织通过各种关系收集根据地急需药品和器材，再通过地下交通线送到根据地。然而，这些途径获取的药品远远不能满足医院的需求，于是医院医务人员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一方面亲自上山采集各种草药，另一方面想办法用其他物资替代药品。比如，缺少酒精，就用食盐水消毒；食盐紧张，就改用金银花，或者轻轻刮到外面青的一层竹灰研成粉末作为消炎的代用品。同时，他们还向当地的草医和土郎中请教，从群众中总结出许多治疗伤病的药方，并编写了药书。

在医疗器械方面，医务人员也想出很多“土办法”，比如利用当地生长的竹子和杉木，做成消毒盆、镊子等医疗器械。没有骨锯，医务人员就拿木匠的细齿小锯子，经消毒处理后，用来做外科手术。物资的匮乏让医务人员十分注意节约，一块普通的纱布，一条普通的绷带，都是洗了用，用了洗，直到完全不



位于江西省井冈山市的中国红军第四军医院旧址。

土豆：志愿军的应急口粮

■周一

在近期几部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影视作品里，经常有这样镜头：一个志愿军战士，从怀里掏出一个又黑又圆的“地雷”（即土豆），艰难地咬下一口，又赶紧放回衣服里暖着。这种艰苦的伙食保障条件，给众多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人们不禁要问，参加东线作战的志愿军第9兵团官兵为什么大多以土豆为口粮呢？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时，我国的粮食总产量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从总体上看，供给出国部队的军粮应该问题不大。尤其是作为“总后方基地”的东北地区，大米年产量一直居于全国首位，而且最靠近抗美援朝战场前线。按照常理，第9兵团入朝就算条件再艰苦，也不至于只能吃土豆。

然而，供给前线部队的军粮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客观困难。首先，就是运输问题。在组建东北边防军之初，中央的计划是筹集1000辆汽车保障运输，尤其是粮秣的输送。当时，我国没有独立生产汽车的能力，原总后勤部只能通过清理库存、收集缴获、地方征调、削减公车等方法，勉强凑足了这个数量的汽车。但是，这批汽车几乎全部用于保障西线志愿军主力作战，东线的第9兵团能够使用的汽车基本上只有兵团本级和所属各军自带的少量运输车，相对于庞大的粮秣运输需求

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其次，就是东线的长津湖一带的极寒天气。第9兵团入朝时，朝鲜北部已经进入最为寒冷的冬天，部分炊事班把大米饭做好之后，还没等送到战士们手里就已冻成“大米疙瘩”。最后，是部队的作战任务发生变化。第9兵团的主要作战区域在长津湖一带，这里是朝鲜半岛北部最大的高原——盖马高原，山峰林立、道路蜿蜒。为实现分割包围敌军的目的，不少连队按照命令要执行向敌侧后穿插迂回的行动，运动距离较远，并且敌机空袭威胁较大，生明火做饭极易暴露目标。在这种条件下，部队急需一种便于携带、方便速食的随身口粮，以便及时补充能量。

这样看来，土豆成为第9兵团官兵的应急口粮，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它既能够为官兵提供充足的热量，又方便携带、不易变质。更为有利的是，朝鲜北部山区的农村种植大面积的土豆，志愿军到达此地之后也方便就地补给，在较大程度上缓解了部队的“粮荒”。

土豆虽好，但也不能长期食用，而且冻土豆加上冰雪水，容易造成官兵腹泻，影响战斗力。随后，原总后勤部根据部队需求研发一款新式军粮——炒面，逐渐成为抗美援朝战争初期部队的制式军粮，为保障部队作战立下汗马功劳。